



論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

On Research Ethics of the Political Archives

■ 葉志清 Yeh, Chih-Ching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政治類檔案在臺灣政治史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在我國特定時空脈絡下也浮現出研究倫理的議題亟待探索。本文從「個體的反身性」以及「法律與社會變遷」兩個層面，針對政治類檔案的研究倫理議題加以評析，希冀能對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帶來省思與啟示。

ABSTRACT

Political archiv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The ethical issues in research also emerge out of our national particular time-space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thical issues in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two dimensions which are "individual reflexivity" and "law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is paper, we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ers.

關鍵字：臺灣政治史、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反身性、社會變遷

Keywords: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political archives, research ethics, reflexivity, social change



壹、前言

我國身為後威權國家，在邁向民主的道路上可謂筚路藍縷，備極艱辛。無論是承載戒嚴時期^(註1)澱積的歷史遺緒，或是以先進國家為師，亟欲建構新的制度典範，都是在混沌跌撞的學步狀態中，逐漸打造自身獨特的發展理路。「歷史——當下——未來」三個時間向度彼此的饋向循環，如連體嬰般難以切割，都是吾人觀察臺灣政治發展不可或缺的方便法門（佛家語）。從歷史向度出發，戒嚴時期在反共與反臺獨的政策大纛下，強勢國家（strong state）所採取的管制措施^(註2)，衍生出為數頗多侵害人權之政治案件^(註3)。民國（以下同）76年7月，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學術研究也因應環境變遷而獲得解嚴。爾後，臺灣政治史在政治學者及歷史學者的共同關注之下，匯流成一個新興且不斷茁壯的學術場域（field）^(註4)。在其中，透過政治類國家檔案^(註5)的徵集及研究，很多史實被挖掘出來，或者說被建構出一個較為清晰的圖像，該類檔案遂成為國內學界研究政治史的主要素材之一。當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所典藏的政治類國家檔案，主要分為二二八事件類、美麗島事件類及其他重大事件類等三大類型，檔案總長度為388.68公尺，起迄年度為27至89年，檔案產生者來自總統府、國史館、行政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局等機關^(註6)。從檔案局對該類檔案的徵集方向來看，大抵涵蓋了影響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重大政治事件範疇，也就是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重要政治事件檔案，而國家檔案徵集作業仍是現在進行式，勢將持續擴充檔案典藏之數量與長度。

植根於筆者對政治史的研究旨趣，歷經口述史與檔案判讀之訓練，深感二者皆為探索歷史真相不可或缺之路徑，尤其官方檔案更如實反映國家機器的統治面貌，然而在解讀與應用檔案時，又不得不觸及到研究倫理的核心議題：研究者的價值預設與權力機制將影響其對檔案內容的詮釋；再者，一味追求真相之呈現極可能對人權隱私產生排擠作用，而產生孰重孰輕的問題。換言之，囿於被賦予實踐轉型正義的冠冕^(註7)，讓政治類檔案研究除了純學術的目的外，難免被貼上高敏感度的標籤，這個敏感度蘊含了意識形態對立、政治立場投射、研究對象隱私權與公共利益衡平等盤根錯節的糾葛狀態。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我們如何重新理解政治類檔案研究的倫理意涵？在方法論的層次，研究者如何面對價值、權力與反身性的課題？在具體的操作層次，檔案法有關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的爭議是在何種社會背景下形成與變遷？這將是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意識。

貳、檔案研究的倫理新詮

從字義上來看，研究倫理主要指涉學術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必須遵守的倫理道德。具體言之，一方面指研究者反躬自省研究過程與結果是否實踐求真求善的態度，一方面則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必須正當且合法——研究對象視實際的研究脈絡，可能是人類或非人類（如物品、動物、文獻檔案等）。這樣的詮釋，多少必須承認研究倫理所帶有的規訓或紀律（discipline）意涵^(註8)，亦即其落實係透過明文化與制度化，讓形式上為他律的倫理規範得以潛移默化地內化為研究者的思維理則，俾成為自律的信仰。



國內、外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社群，幾乎都有訂定該領域的研究倫理規範。本文係以探討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為核心，較有直接關聯的學門大抵為檔案學、歷史學、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等，這也呈顯出檔案研究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e）特色。首先觀照國外社群，國際檔案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簡稱ICA）之「倫理準則」（Code of Ethics）（註9），列舉了確保檔案完整性、脈絡化的檔案鑑選、檔案保存與應用的真實性、檔案資料的近用性與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記錄與證成（justify）、公平地開放應用、依法兼顧檔案使用與隱私、不攫取不當利益、持續學習與分享新知、共同促進世界檔案資產的保存應用等要點；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SAA）之「檔案人員核心價值聲明及倫理準則」（SAA Core Values Statement and Code of Ethics）（註10），在倫理準則方面臚列了職業關係、判斷、真實性、安全性與保護、接近（access）與使用、隱私、信任等綱領；英國檔案與紀錄學會（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簡稱ARA）之「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註11），則縷述了達成學會目標、確保檔案完整性、脈絡化的檔案鑑選、檔案保存與應用的真實性、檔案資料的近用性與可理解性、記錄與證成、公平地開放應用、依法兼顧檔案使用與隱私、不攫取不當利益、持續學習與分享新知、共同促進世界檔案資產的保存應用等面向，大抵與國際檔案學會之規範雷同。

將視角轉回國內學術社群，從臺灣政治學會與中國政治學會聯名公布的「政治學專業倫理守則」（註12）觀之，涉及隱私權的部分占有不少的份量，例如2.2規範「學者進行研究與發表研究成果時，應避免造成不利研究對象之後果。」、2.4規範「研究者應保護研究對象之匿名性，若研究對象主動同意公開其個人資訊則不在此限。」、2.5「規範研究資料涉及機密或個人隱私時，研究者具有保密義務。」及2.9「學者對研究對象之調查研究，如需政府協助取得資料，其資料取得方式應符合政府資訊公開及隱私保護等相關法令規定。」等，然而也有一個例外規定——2.7「被研究者參與研究之意願應被尊重，但具下列情形之一並經研究者所屬權責機構同意後，可進行被研究者未經告知同意之隱蔽研究（covert research）：一、除非進行隱蔽研究否則研究無法進行，如研究對象於知道本身是研究對象時，將改變其回應致影響研究有效性。二、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間具有不對等權勢關係，或研究對象為社會上具極大權勢者，或有損社會公益之團體與機構等，極可能對研究者帶來生命、自由、健康之威脅者。三、隱蔽研究能獲得之學術成果價值，大於所導致之告知同意倫理原則之傷害。」，可見隱蔽研究依學界當前的多數意見是可以部分排除隱私權的考量，然而此一原則之運用應視實際的研究脈絡而謹慎為之，畢竟其研究風險與適法性仍需由研究者自行評估與承擔。此外，臺灣社會學會所訂定的「臺灣社會學會研究倫理守則」（註13），不僅在前言中揭櫫「尊重研究對象的人權、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亦將「尊重人權尊嚴」列為其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實踐準則亦相當詳盡地規範「資訊保密」及「告知同意」的各項做法，但也列有隱蔽研究之相關說明。國內其他學門如人類學與民族學、語言學、教育學、管理科學、社會工作、犯罪學、人口學、地理學、傳播學、心理學、民族誌影像學等學術社群也都訂有相關的研究倫理規範（註14），至於檔案學界與歷史學界，則尚未見到研究倫理規範的出現。檢視完上開各學術社群的研究倫理



規範後，吾人可以發現：「研究對象的隱私權保障」幾乎是各界達致的行為共識，或許我們可稱之為研究倫理的首要圭臬。這也反映研究倫理之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係因應著人權保障思潮的發展而與時俱進，被鑲嵌（embedded）在整個研究倫理的價值體系中，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

回歸檔案研究的脈絡，筆者想要提醒：假如研究者只將檔案當成冷冰冰的研究客體，則容易忽視檔案是歷史的載體——不僅是不同時空脈絡下人類活動與政府治理互動下的產物，更再現（represent）了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本體論（ontology）與知識論（epistemology）意涵（註 15）。關於超越檔案客體論的看法，筆者認為有兩個新興思潮值得重視。其一為魯曼（N. Luhmann）所提出的社會系統理論（social system theory）（註 16），依據他的見解，任何資料文獻都可視為具備自我生產能力的生命體。借用其觀點，我們也可以將檔案看做具有自身生命的系統，與其他不同系統（如政治系統、文化系統、法律系統、心理系統）之間有著緊密的溝通聯繫，形成了自身內在的體系網絡，亦產生獨具特色的自我參照（self-reference），以進行自我生產（autopoeis），在當代社會充滿象徵符號的互動情況下，檔案系統以其自身的自律性不斷地擴充及增值（註 17）；其二為拉圖爾（B. Latour）等所倡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註 18），亦揚棄物質只是固態客體的傳統觀念，其運用符號學（semiotics）對符號如何形成脈絡化意義（contextual signification）的觀點，來研究一個文獻如何在許多文獻交互定義中形成的過程。正如符號的意義是在句子中被定義的，一個文獻是根據其在眾多文獻對其引用、駁斥等脈絡中，在更具體或更不具說服力的過程中，成為特定的行動者。爰此，檔案文獻作為研究過程中的行動者，是活躍且動態的，透過不斷地轉譯與漂移，殊值觀察的正是不斷介入現實發展軌跡的行動。行動者在網絡連結中因緣際會地聚集與實作（contingent gathering and practice），檔案與研究者的關係被穩定下來，成為形構現實存在的基礎（註 19）。換言之，這樣的觀點不再是「我註檔案」，而是翻轉傳統思維軸線的「檔案註我」。

綜上所述，研究者與檔案（包含從中衍生的社會互動）之間的倫理關係，除了主體 / 客體對彰的平面關係外，更可拓展出較為彈性動態且多維度的思維模式，讓檔案研究增添更多功能分化與促動性（enacted）意涵。以下筆者將從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的核心意蘊出發，先從個體層次探討研究者對政治類檔案研究的方法論反思，再外推社會變遷層次分析該類研究所面臨的隱私權與公共利益兩難（dilemma）現象（研究架構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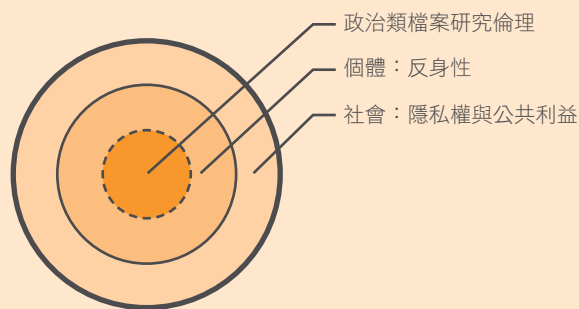


圖 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參、方法論：價值、權力與反身性

政治類檔案的研究過程無疑是綰繫政治性（politics）與歷史性（historicity）的表現。因為解構政治檔案，重構政治史觀，必然涉及政治與社會價值的重分配；在重構與辯證的過程中，各種觀念、價值、意識形態也呈顯遞嬗、轉化、新生的貫時性格。然而，一個老問題時常困擾著我們：任何知識的追求不都是在客觀的目標下所進行的嗎？如果承認知識無法真空，是摻雜價值的產物，那麼是否有真正客觀的知識？這個議題可溯源自韋伯（M.Weber）對研究方法的價值自由（value-freedom）與客觀性之分析（註20），韋伯所謂價值自由係揭示任何研究都帶有價值預設的前提下，面對價值我們應該發展出省察與價值有關聯事物的自主能力；社會科學知識之預設是主觀的，亦即我們實踐地相信研究帶給我們的真理是有價值的，而客觀性其實就是相應於這樣的主觀性格而言，並無所謂絕對的客觀性。關於歷史研究，韋伯認為歷史詮釋就是對歷史個體對象做因果說明：研究者必須回溯歷史人物當時的處境，以當時的可能性（將人心之算計與情感狀態納入考量）作為理解之基礎，方能達到因果說明的目標。至於歷史學除了探究具體事件和具體行為結果的客觀性因素外，有沒有辦法找到應負刑責的「犯罪者」並加以審判呢？韋伯似乎是持較悲觀的看法（註21），這點對當代政治類檔案研究者所持的追求真相信念（找出加害者並加以懲罰）而言，恐怕仍有進一步思辨與討論的空間。

既然學術研究與價值關聯無法避免，那麼我們應該注意任何價值的注入與傳播都必須仰賴權力的機制，誠如傅柯（M.Foucault）所言，知識與權力總是相互呼應（註22），兩者的纏繞交織極其深邃，想要單獨廓清知識或權力的面貌，都無法窮盡彼此之間曖昧難明的互聯肌理。任何知識的建構必同時伴隨著權力的生產，兩者如影隨形、如膠似漆。到底我們習以為常的各項知識是怎麼生產而來的？為何我們會把習得的知識當作普世或永恆的真理？當政治類檔案研究成為政治史素材的重要構造元素之一，從研究者如何研究檔案的過程，到其產出檔案研究的知識結果，是在那些權力運作的範疇下思言云為，這些權力是研究者刻意或無意的習性？在我國特殊時空背景架構下，政治類檔案之研究多集中於重大政治事件之研究，也就是說，檔案之素材選擇、研究觀點的詮釋、檔案之申請應用及官署之開放程度等，都是充滿政治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部署，而這些權力的來源係來自四面八方，透過一種競爭的態勢，構建了臺灣政治史的多元知識體系。更進一步地說，藉由檔案研究，除了表徵研究者研究旨趣之意向性外，更突顯臺灣在地脈絡下政治史知識發展的意涵：以研究者之詮釋與解放之權力去解構或挑戰既有的史觀權力，權力間的協商對話與搓揉摩盪正反映著不同史觀的詮釋差異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競逐。

面對知識與權力的糾葛，反身性思考是一個突破的進路。儘管反身性概念已有多位學者提起，但波狄爾（P. Bourdieu）的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則是將其更為精緻化。「反思社會學的基本物件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於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波狄爾如是說（註23），每個學者都同時受到其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與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所影響，又因為固有的偏見與習性會使學者在構建研究客體時，不自覺地將自身與客體的關係投射到研究客體



中，導致對內化於心智概念與分析工具中的預設缺乏警醒。另一方面，政府與社會大量對學者提出了政治宣傳、政策諮詢、知識分享等服務需求，使得學者誤以為可以恣意施展才學、指點江山，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結構牽著鼻子走，這種情形就是學者個體的無意識及學術的無意識（註24）。波狄爾希望我們可以透過社會歷史條件的分析，去揭露知識生產過程背後的預先建構之物，這也是權力得以運作的地方，然後對權力的關係保持警醒（註25）。因此，從事政治類檔案研究時，研究者首先要反思自身所在的社會結構與學術結構位置，再來則要檢討自身與權力場域的親疏關係，莫讓偏頗的立場與利益的共謀，遮掩了批判性的求知精神（註26）。

魯曼提出的二階觀察（second-order observing）（註27）亦與波狄爾的反思社會學有異曲同工之妙。魯曼認為，任何研究都是以研究者的主觀研究目的、角度、方法及其技術預設為出發點，亦即每個研究者都是從自身的權力與立場進行研究程序，但過分相信自身研究是絕對客觀的迷思，不願意進行認真的反思，則難免盲目而無法探尋自身沒有意識到的部分。換言之，研究者永遠看不到他所看不到的事物，因為一切研究都無法研究自己（註28）。如果說研究者的研究過程與結果是第一階觀察，那麼其他人對「研究者的研究過程與結果」進行觀察，就是第二階觀察：也就是對觀察的觀察。第一階觀察者係執著於某種價值來研究事物，所持的態度是價值的灌輸，故而不同的第一階觀察者會產生價值衝突的局面。但第二階觀察者係以一種保持距離並帶有變動性的問題察覺態度來看待各種歧見，也能內省自身見解的偶然性（contingency），第一階觀察與第二階觀察都必然具有觀察的盲點。一個試圖將第二階觀察加以內化的學者，除了保持「永遠保留一個眼睛看自己」的心態看待自身的研究結果，亦可對他者的研究結果有著「雖不同意您的看法，但願意理解您的立場」的認知，這對知識的對話與進展將有莫大助益（註29）。政治類檔案研究者在各自歧異的認知立場前提下，所產出的研究結果必然會呈現多樣性，這種第一階觀察的作品將促使更多第二階觀察者的參與與評價，儘管第二階觀察與第一階觀察間無必然的高下優劣之分，但不同聲音的匯聚與辯證，愈有助於臺灣政治史知識體系的健全性。

當今檔案學界，亦出現了對檔案研究反身性探討的趨勢，對於檔案自身有關再現、權威、中立性、客觀性及權力等議題進行省思與評析（註30），這也反映檔案系統與外在環境互動下自我參照與自我生產的特色。

肆、檔案法與社會變遷：隱私權與公共利益之衡平

政治類國家檔案徵集在檔案局成立初期，是該局的工作重點之一，嗣後則因社會輿論與立法委員之關注，長期以來在應用層面存在不少爭議，迄今仍難獲得高度共識。這些爭議大致可歸納為二個爭點：一為政治類檔案管理有無制定專法之必要；二為所謂戒嚴時期重大政治事件之「加害人」界定，及其隱私權是否與「被害人」隱私權有同等保障之價值。關於爭點一，主要為部分立法委員曾多次提案（註31），檔案法並未區分戒嚴時期政府檔案的存在目的（公開揭示、教育警示）與一般國家檔案（保存國家記憶）在本質上的差異，故參考德國經驗及因應本地脈絡後，提出「政治檔案法」草案，主張政治案件之檔案另以專法特別法處理，俾有助轉型正義之推動。至於爭點二，可舉



102年7月31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的「臺灣轉型正義政府作為之探討」公聽會^(註32)為例說明，會中有歷史學者主張歷史研究就是講究真名真姓，檔案應用若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將有礙歷史研究之進行，這也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個案以代號呈現）在研究立場及方法方面的最大差異。此外，會中亦有政治受難者家屬及相關團體代表訴求歷史真相迄今未明，政治案件的加害者根本不知在哪裡，以及不滿檔案局在民眾申請應用政治類檔案時遮掩部分內容的作為。

為回應社會各界對檔案法修法的殷切期望（包含上開二大爭點以及解決檔案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在適用上的競合問題），檔案局在委請專家學者進行研究^(註33)及綜整各界意見後，將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查通過，行政院於102年5月27日函請立法院審議^(註34)，其中有關國家檔案涉及開放應用與隱私權衡平的部分，其修正重點揭示：「……四、國家檔案以開放應用為原則，僅於必要最小範圍內規範其限制應用事由，以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其他法令或契約規定應秘密或限制、禁止公開事項、攸關國家安全利益、涉及侵害個人隱私、妨礙犯罪偵查及政府機關業務執行、其他特殊情形經立法院同意等情形為限，並增列最遲開放應用年限。……七、增訂二二八事件或戒嚴時期特定事件之當事人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與其本人所涉案件相關之國家檔案，應全部提供之情形，並兼顧其他第三人之隱私權益。……八、增訂涉及個人隱私之國家檔案得提供學術研究之程序及應用方式。」，立法院法制局嗣於同年8月8日召開該草案評估報告（初稿）座談會，並就行政院提案之相關問題進行評估^(註35)，有關檔案應用部分提出了「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上有關限制時效應再予縮短」及「國家檔案之運用應更開放，若遇限制事項，宜增訂徵詢機制」兩項修正建議。立法院並於第8屆第3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制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組織法時，通過1項附帶決議：「建請檔案管理局應儘速完成檔案法修正以放寬政治案件檔案使用，並主動徵集政治案件檔案」^(註36)。經由觀察行政權與立法權之往返互動，我們大致可以瞭解檔案法的修法近況，當然後續的修法結果仍須持續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研究者申請國家檔案之應用程序將有明文規範，這對研究對象隱私權與研究者追求的釐清重大政治案件真相之公共利益衡平爭論而言，已有一個折衝調解的機制存在。雖然爭點尚未全然解決，但吾人可以發覺檔案法之修正係不斷朝向兼顧各方需求之方向邁進。

從法律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法律在社會中誕生，在社會中施行，也必然是社會價值的反映^(註37)。檔案法在前揭社會價值衝突中能否扮演好社會變遷的工具？甚麼是這個角色的限制？即便說當前公共行政講求公部門必須前瞻與回應民眾需求的趨勢，檔案法之主管機關——檔案局在國家科層體系的結構限制下，倘若賦予其積極自主的行動者角色，恐有進出結構——行動之困境^(註38)。我們必須承認法律因素（制度、實踐、理念）既是影響社會變遷的自變項，同時本身也受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勢力等依變項的影響，法律因素與社會勢力的相互激盪是複雜的、辯證的互動。如哈伯瑪斯（J.Habermas）所主張：溝通塑造了法律。面對檔案法的爭辯，藉由重建法律有效性的過程，不單單是思索法律條文中哪些受到社會成員遵守？哪些受到拒斥？還要超越法條的表面理由，尋找其背後的深層結構，因為所有法律意義與解釋的總體中有著潛在的象徵性結構，存在於社會信念及論述中，形成規範性與認知性的模型、典範、前提、背景預設，這些條件構成了法



律論述的無意識與無反思，卻有著深度影響的潛勢，若能將其找出並加以廓清，將有助於信念的澄清，化解溝通的扭曲，俾拆除各方勢力的偏見與迷思。假如對檔案法的思考，只偏重於立法、執法與行政技術層面，而減少道德脈絡與文化結構的輔弼討論，將使法律正當性弱化。法律正當性來自於慎思明辨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經由溝通方能達成共識。檔案法對於實踐轉型正義的意義，並非其有制度上高超的貢獻或成就，毋寧為其接受辯論、挑戰、批判，通過各方的檢驗，讓任何社會參與者不只相信這公平的檢驗過程，也相信討論的內容含有真實、合理、合法的實質性，才會把檔案法所建構出的法秩序視為正當的（註39）。

歸納言之，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之適法性係附著在整個檔案法的脈絡中，研究者個人對於隱私權保障與追求轉型正義真相之法益衡平的認知解讀與尺度拿捏，將形成研究倫理立場的差異光譜，基於憲法保障學術自由之基本權前提下，只要行為合理合法都是必須給予尊重的。我們不用擔心「各說各話」的衝突局面繼續上演，畢竟價值爭辯與尋求共識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伍、代結語

在聯合國網站中，明確地揭櫫「瞭解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truth）已成為普世價值（註40）。對於我國戒嚴時期政治事件中「加害人／被害人」的二元結構，阿蘭特（H.Arendt）有關「邪惡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註41）以及包曼（Z.Bauman）「現代性／科層體制是大屠殺生成與運作的必要條件」之觀點（註42），或多或少已提供一些可供詮釋的理論資源。然而，歷史研究不能不著床於在地脈絡，臺灣的政治發展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與存有意涵。歷史檔案的作用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考究，其研究成果亦可作為政府發展政策的依據，亦即檔案在當代政策形塑過程中扮演著具有影響力的證據角色。在歷史與政策的互動面向中，學者所關注的面向是賦予歷史獨特的性格，形塑檔案新的角色，重新書寫歷史，俾呈現出一種普遍的公共關懷，而非讓歷史服務於政治成為其奴婢（註43）。就我國現況而言，政治類檔案研究結果可以運用在人權與司法政策制定的脈絡中，讓政府得以理解前車之鑑，避免重蹈侵害人權之覆轍，也期待學術社群對政治類檔案研究倫理的反身性思考能夠帶給臺灣政治史研究場域嶄新的氣象。

註 釋

註1：戰後臺灣戒嚴時期，亦稱威權統治時期或是白色恐怖時期，迥異於前揭較通俗性的指稱，柯朝欽援引政治哲學家史密特（C.Schmitt）及阿岡本（G.Agamben）的理論，認為此段時期可詮釋為一種「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除了具有憲政上的「戒嚴狀態」以及主權權力的「任意性例外決斷」意涵外，更體現了裸命（bare-life）的特質——在此裸命係指涉被決斷的每個赤裸生命忽然被「排除」的內部流亡狀態，亦即公民權面對主權暴力的例外狀態時，隨時可能淪為無遮攔的赤裸狀態而任予宰割與流離失所，參閱柯朝欽，〈活在例外狀態之中：論50年代台灣政治犯的社會排除〉，發表於「2009 流離、家園與認同工作坊」（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民98）。

註2：對照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阿圖塞（L.Arthusser）提出的壓制性國家機器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或可粗略理解國民政府遷臺後以迄解嚴之長時期統治行為，參閱 L.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121-176. 在主權權力及規訓權力的行使之外，傅柯所論述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提供了另類的觀察視角，治理是一種技藝（art），係指涉國家針對人口／生命權力的各種調查統計與管制機制，參閱 M.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translated by R.Braidotti and revised by C.Gordon, in G.Burchell, C.Gordon and P.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7-104.

註3：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可概分為對親中共或左翼言行的打擊、對臺灣獨立運動及主張者的整肅、對原住民精英的整肅、對民主運動的壓制、政治權力的鬥爭、文字獄、情治特務單位的內部鬥爭、特務人員為了爭功領獎製造的冤案假案等8種類型，參閱李筱峰，〈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載於倪子修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討論》（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民90）；亦有學者依據判決書的內容，將政治案件細分為參加左翼組織、思想左傾、資匪、知匪不報及包庇匪徒、二二八相關之臺獨案、校園監控、反國民黨言論、軍中不滿言論、廁所塗鴉、讀書會、任職匪區或參加組織、被俘而為匪工作、投匪、洩漏軍機、誣陷、政治鬥爭、獎金密報、民主運動、原住民獨立運動、案件不成立、其他等21種類型，參閱邱榮舉、張炎憲、戴寶村，〈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數量與類型分析（1953-1987）〉研究計畫（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民97）。

註4：將學術研究的實踐空間視為場域，係借用波狄爾的觀點，主要用以形容臺灣政治史的研究領域，是一個由掌握不同類型資源的行動者為爭奪象徵資本（史實的定義與詮釋）所進行的網絡與力場，參閱P.Bourdieu, and L.J.D.Wacquant,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局，1998），頁134。

註5：從管有機關的角度觀之，政治類檔案應包含國家檔案及機關檔案二種，本文在行文中並未嚴格區分，讀者可自行依據文意脈絡判讀所指之對象。

註6：此為統計至103年3月31日之資料，檔案內容大要請參閱國家檔案資訊網網頁，〈館藏介紹／國家檔案館藏〉。<https://aa.archives.gov.tw/ArcPublish1.aspx>（11 Apr. 2014）。

註7：參閱吳乃德、吳志光、吳叡人、顏厥安，〈轉型正義對檔案開放應用影響之研究〉（臺北：檔案管理局委託研究報告，民96），頁83。

註8：discipline 在英文中也是學科的意思，故研究倫理不啻為各學門得以自我參照的紀律規範，也就是該行的「行規」，但其對不同學術社群成員的約束力，充滿著歧異性。

註9："ICA Code of Ethic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Website*, <http://www.ica.org/5555/reference-documents/ica-code-of-ethics.html>（1 Apr. 2014）。

註10："SAA Core Values Statement And Code Of Ethics",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Website*, <http://www2.archivists.org/statements/saa-core-values-statement-and-code-of-ethics>（1 Apr. 2014）。

註11："The ARA Code of Conduct", *The 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 Website*, http://www.archives.org.uk/images/documents/ARACouncil/ARA_Code_of_Conduct_final.pdf（1 Apr. 2014）。

註12：臺灣政治學會網頁，〈一般公告〉（民101年5月22日）。<http://www.tpsahome.org.tw/news66.html>（1 Apr. 2014）。

註13：臺灣社會學會網頁，〈研究資源〉。http://tsa.sinica.edu.tw/research_01.php（1 Apr. 2014）。

註14：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網頁，〈國內相關研究倫理原則與規範〉。<http://rec.chass.ncku.edu.tw/ethics/ethical-principles-and-norms/domestic>（1 Apr. 2014）。

註15：在此本體論是指社會存在的本質構造，知識論則是指有關社會存在的知識類別與內容。

註16："Niklas Luhmann", *Wikipedia Webs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klas_Luhmann（1 Apr. 2014）。

註17：參閱高宣揚，〈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臺北：五南，民91），頁28-29。

註18："Actor-network_theory," *Wikipedia Webs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or-network_theory（1 Apr. 2014）。

註19：參閱林文源，〈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行動本體論〉，《科技、醫療與社會》4期（民96年4月）：65-108。

註20：參閱M.Weber, *社會科學方法論*（黃振華、張與健譯）（臺北：時報，民80），頁11-125。

註21：參閱蔡錦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釋義〉（臺北：唐山，民83），頁29、54、56、74。

註22：參閱M.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lated by A.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27-28.

註23：參閱P.Bourdieu, and L.J.D.Wacquant,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局，1998），頁39。

註24：參閱文軍，島嶼邊緣網頁，〈布迪厄“反思社會學”及其對社會學研究的啟示〉（民91年4月12日）。<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scholar%20and%20specialist/bourdieu/pb03.htm>（11 Apr. 2014）。

註25：參閱鄭祖邦，〈對布迪厄社會學知識進展的考察〉，《社會理論學報》6卷1期（2003年）：101-135。



註 26：參閱洪謙德，《當代政治社會學》（臺北：五南，民 95），頁 171。

註 27：參閱 G.Kneer, and A.Nassehi, *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臺北：國立編譯館，民 87），頁 126-130。

註 28：參閱高宣揚，《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臺北：五南，民 91），頁 291-292。

註 29：參閱黃鈺堤，〈魯曼觀察理論與政治論述解讀〉，《政治科學論叢》56 期（民 102 年 6 月）：39-90。

註 30：參閱 M.Caldera, and K.Neal, (eds). *Through the Archival Looking Glass: A Reader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14), 1-90, 195-212.

註 31：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215 號委員 提案第 14455 號，〈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22 人……提出「政治檔案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2/13/LCEWA01_080213_00041.pdf〉（21 Apr. 2014）。

註 32：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63 號政府提案 14610 號，〈行政院函請審議「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4/02/LCEWA01_080402_00057.pdf〉（21 Apr. 2014）。本案修正重點理由摘述如下：國際上國家檔案均有提前開放應用趨勢，放寬國家檔案原則上應開放應用，僅於必要最小範圍內予以限制，考量國家檔案趨近社會發展史料，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依檔案法開放應用之國家檔案，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規定；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之精神，為利特定事件當事人藉由檔案瞭解事件過程，並兼顧保障第三人之隱私權、資訊自由等權益，應對其全面開放應用，另有侵害第三人之個人隱私情形者，為促進檔案當事人瞭解案情內容，得全案提供閱覽、抄錄，如需複製，則經抽離、遮掩第三人之隱私資料後提供，以兼顧資訊權與隱私權之平衡；為促進學術研究，對於學術研究機構有必要使用國家檔案中涉及之第三人隱私資料，可於檢附證明文件並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放寬提供應用之限制，增訂提前提供閱覽、抄錄之規定，如有複製需要，則於抽離、遮掩第三人之隱私資料後提供之。

註 33：內政部網頁，〈「臺灣轉型正義政府作為之探討」公聽會會議紀錄〉。〈http://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1_pdfsam_%E7%B4%80%E9%8C%84%E8%88%87%E7%B0%BD%E5%88%B0.pdf〉（21 Apr. 2014）。

註 34：參閱劉定基、謝碩駿、沈政雄，《國家檔案開放應用及其限制之研究》（臺北：檔案管理局委託研究報告，民 101），頁 209-238。

註 35：立法院網頁，〈法制局研究成果 / 資料查詢 / 法案評估 / 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http://www.ly.gov.tw/05_orglaw/search/lawView.action?no=18177〉（21 Apr. 2014）。

註 36：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215 號政府提案第 12994 號之 2，〈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函，為本院制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組織法時，通過 1 項附帶決議，檢送辦理情形，請查照案〉。〈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4/06/LCEWA01_080406_00158.pdf〉（21 Apr. 2014）。

註 37：參閱張志銘、劉威辰，〈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植根雜誌》27 卷 9 期（民 100 年 9 月）：25-40。

註 38：林鍾沂指出，科層官僚體制雖非權力的主宰者，但其在行政、立法、司法體系與人民所賦予的責任間，可運用其專業化知識、歷史傳承、智慧積累、制度化規則及社會信賴，進行一系列的因果能勢（casual power）作為，製造差異化的效果，以達成公共利益的目標，這種進出結構限制與行動自主的困境所為之決定，不啻展現出科層官僚體制之內在理路，參閱林鍾沂，〈科層官僚制的理論發展及其定位〉，發表於「探索公共行政真義：吳定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民 97）。

註 39：參閱洪謙德，《法律社會學》（臺北：揚智，民 90），頁 86-87，325-330。

註 40："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Right to the Truth Concerning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for the Dignity of Victims," *The United Nations Website*, 〈<http://www.un.org/en/events/righttotruthday/documents.shtml>〉（21 Apr. 2014）。

註 41：阿蘭特在參與觀察執行尤太人大屠殺的納粹官員艾希曼（A.Eichmann）耶路撒冷大審後，提出顛覆傳統大奸大惡之觀點，她認為邪惡之生根與蔓延，是如此庸常且例行化，相當細緻地描繪出「加害者（們）」在極（威）權體制下奉命行事之心理習性（對道德良知的無思考），參閱 H.Arendt,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施奕如譯）（臺北：玉山社，民 102），頁 153。

註 42：包曼認為，尤太人大屠殺源於現代性（modernity）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及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這些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與受害者密切交織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荒謬實為邏輯的必然，參閱 Z.Bauman, *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譯林，2002），頁 111-154。

註 43：參閱 V.Johnson, and C.Williams, "Using Archives to Inform Contemporary Policy Debates: History into Polic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32, 2 (Oct. 2011): 287-303.